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

Richard J. Bernstein

[美国]理查德·J.伯恩斯坦 著 黄瑞祺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

Richard J. Bernstein

[美国]理查德·J.伯恩斯坦 著 黄瑞祺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 / (美) R. 伯恩斯坦 (Bernstein, R. J.) 著; 黄瑞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4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SBN 978-7-5447-0502-8

I. 社... II. ①伯... ②黄... III. ①社会哲学—研究 ②政治哲学—研究 IV. C91—02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0474 号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by Richard J. Bernstein

Copyright © 1976 by Richard J. Bernste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court,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029号

书 名 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
作 者 [美国]理查德·J. 伯恩斯坦
译 者 黄瑞祺
责任编辑 黄 颖
原文出版 Methuen & Co Ltd, 197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502-8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中文版序

《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一书已出版三十余年,从那时起,所有社会科学以及我们对社会政治理论的理解都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不过,我仍然相信在这本书中所形成的论旨——一个适当的社会政治理论必须是经验性的、解释性的、批判性的——已经被证实了。这并不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理论,而是社会政治理论的功能的三个方面。为了能领会我在这本书中所说的,我们需要重建其(社会政治理论)历史脉络与智识脉络。二战后社会科学有惊人成长,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许多重要社会科学家把社会科学看作是行为科学,即人类行为的科学。他们的行为科学观主要是基于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或更确切地说,基于他们认为是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行为科学(因而)是研究人的自然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对崭新及“年轻”。但是希望及期待是社会科学能有快速进展,能比得上自然科学及物理学已经实现的巨大发展。这个时期的精神可借由心理学家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来表达,在1943年他写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科学将在当前展现一种足以媲美物理学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与牛顿时代的发展。”赫尔的期待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与心理学等领域的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所共享。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社会科学家主要不是受到物理学实际作为的影响,而是受逻辑实证主义者及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提出的自然科学

观所影响。依据逻辑经验主义者对科学的理解,理论说明依循一种假设—演绎模型,需要对关键性概念下工作定义,以及对理论及假设仔细验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去描述及说明经验实在。它预设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明显区别,而且必须避免任何命令式的或规范性的主张。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很讽刺的是,那时许多社会科学家接受了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自然科学观,这种自然科学观受到诸如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以及其他思想家)的严重质疑及批判。

对主流社会科学观的批判还有其他来源。有一种批判来自于受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行动的分析哲学所影响的哲学家。温奇在1958年出版了他的专著《社会科学的理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这本书造成了轰动。温奇利用对维特根斯坦以及行动的语言哲学二者的理解,论证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所采用的“社会”的概念是彻底混淆的。在行为与行动之间,以及在理由与动机之间,存在着概念上的混淆。我们赋予人类社会行动的说明类型和适用于肢体行为的说明类型是完全不同的。分析语言哲学中正出现的一个新领域——行动哲学,挑战并批判了主流社会科学观以及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

不过对于社会学科的自然主义观之批判也还有其他来源。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关于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与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关系已有激烈争辩。在这个时期如狄尔泰等思想家论证人文科学(特别是史学)本质上是解释性的,且主要关注于理解和解释。再者,人文科学中的理解必须与自然科学中的说明小心区分。在20世纪初,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论证理解对于社会学科的方法论而言是必要的。解释学运动也受到胡塞尔现象学探究的影响。舒茨曾经是胡塞尔与韦伯的学生,对于什么是理解及解释人类行动所需要的问题,立足于现象学的洞察,他寻求发展一种新的解释探究途径。尽管社会学科的主流自然主义式探究途径与现象学探究途径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他们都共享了一个预设,即一种恰当的社会科学应该是

“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学科的功能并不是要对社会现象采取一种规范性的或批判性的立场。

但是,这种为社会学学科的“价值中立”辩护以及避免批判的企图,却遭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挑战。哈贝马斯——他曾经担任阿多诺的助理,且熟习社会学学科的各种探究途径——认为社会科学不能避免批判。甚至,他论证社会科学本质上是批判的。在1968年出版的《知识与人类兴趣》一书中,哈贝马斯区分三种主要的认知或知识引导的兴趣:技术的、实践的、解放的兴趣。技术兴趣引导并组织了经验性—分析性科学;实践兴趣引导历史性—解释性学科;而解放兴趣引导批判性社会科学。“系统化的社会行动科学……如同经验性—分析性科学,以生产理论性知识为目标。然而一门批判性社会科学将不会只满足于此。批判性社会科学主要关注于超越此目标,去确定何时理论性陈述掌握社会行动本身不变的规律性,以及这些陈述何时表达意识形态所冻结的依赖关系,而这种关系原则上是可以转变的。”再者,批判所涉及的不只有认知,还有一种情感—动机的基础。“如果不是由对批判的热情所推动,批判将不具有瓦解错误意识的力量。”一门批判性社会科学本质上是规范性的,且关注于那些应当引导人类实践之规范的辩护。在过去三十年间,哈贝马斯已建构一套综合性的沟通行动理论及论辩伦理学理论,然而他仍一贯地坚持一门批判性社会科学的必要性。

我在上述背景下撰写了《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我寻求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整合这些互相竞争的探究途径的洞见,而拒斥我认为误导的(成分)。一门恰当的社会科学必须遵守经验研究及假设检证的准则。但是我也认为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理论观及科学说明观必须抛弃。就如同解释学探究途径及现象学探究途径的拥护者教导我们的,在社会学科中我们不能避免理解与解释。因此一套恰当的社会理论必须是经验性的和解释性的。然而这仍不够。我完全同意哈贝马斯的意见,一套充分发展且健全的社会政治理论也必须是批判性的。它必须探讨那些支

配人类行动的规范,并厘清在这些规范的证立中涉及些什么。

自1970年起,在过去三十几年间社会科学的景象以及有关社会政治理论的争论已经彻底转变了。关于什么是一套恰当的社会政治理论所需要的,出现了许多新的辩论。我已在《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科学、解释学及实践》(1983)和《新全貌: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伦理—政治视域》(1992)二书中尝试探讨及厘清这些关键性辩论。虽然智识领域已经转变了,但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旨和结论依旧是站得住脚的。时至今日它们甚至更为相关。我仍然认同我在结论中所写的:

分析到最后,我们并非面对着互斥的选择,即要么经验理论,要么解释理论,要么批判理论。而是在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之中有一种内在的辩证关系:当我们从事任一环节时,我们会发现涉及其他的环节。一套恰当的社会政治理论必须是经验性的、解释性的以及批判性的。

最后,感谢黄瑞祺博士花费许多时间及努力,他的翻译态度极为认真,使得《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有了可靠的中译本。

理查德·J.伯恩斯坦

2007年3月12日于社会研究新学院

致 谢

在撰写这本关于社会科学之问题和议题的书时，我曾和那些学科的同事们密切合作。哈弗福特学院(Haverford College)提供联合教学、非正式研讨课以及跨学科讨论的稀有的机会。我从与T. 丹德烈亚(心理学)、S.古宾斯(经济学)、W.霍恩施泰因(社会学)、W.麦加佛瑞(人类学)和W.瓦尔德曼(政治学)等人的讨论中获益良多。他们都对我关于这些主题的想法有贡献，不过没有一位会完全同意我在本书中所说的。我要特别提到我受惠于舒默(政治理论)的，我和他在过去已经争辩了八年了。她的敏锐以及她掌握别人意思的能力经常帮助我拓深我自己的思维。

我要感谢人文学科国家基金会，从1972年到1973年当我开始撰写本书时，我接受了该基金会的高级奖学金。我要感谢哈弗福特学院减免我的教学工作并提供打字服务。麦克布莱德和彼特金阅读初稿。他们锐利的批评让我重写了许多。我夫人卡罗尔从她百忙的学术活动中抽出宝贵时间给我详尽的批评。塔拉博雷利和哈格里夫斯帮忙打字；奥唐奈制作索引。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的编辑维伦和布劳德结合了同情的理解与编辑的坚定。最后我要感谢约万诺维奇的忠告和友谊，他具有每个作者都梦想在出版商身上发现的两种美德——耐心和鼓励。

我开始撰写这本书是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德，文特里斯用过的办公

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

桌前，最后在纽约杰伊的办公室完成的，那时我还俯视着阿迪朗达克山。尽管地方的某种精神并不经常提供灵感的来源，但在这件事上它们却提供了。

导 言

20世纪60年代,我正在撰写《实践与行动》一书时,就深深感觉到有些新思潮非常活跃——学术生活的模式、强调的重点以及关注的对象都逐渐在改变。尽管当代的各种思想取向迥异,而且其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但我隐约感觉到有些基本主题却是自黑格尔以降,在各种思想运动中不断且必然出现的。这些思潮都将焦点放在实践和行动的核心概念上,以期对人类处境获致深刻的理解。于是,我开始检视实践和行动的观念在当代四种思潮,即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分析哲学中的重要性。不过当时我主要限于厘清这几种探究途径对于理解人类活动的贡献。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总结该项研究时,宣称那只是一个开端的原因。

当我完成手稿时,一场新的论战正在进行,我在书中所探讨的许多议题,也在这场论战中,以各种崭新且无法逆料的形式出现。20世纪60年代社会政治的骚乱与抗议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受到一连串抨击及彻底批判。正当“意识形态的终结”在美国被叫得震天价响时——当时,主流社会科学家都怀着一种自信,认为他们的学科终究可以建立在稳固的经验基础之上了,因而知识的稳定增长指日可待——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论战爆发了。

有些学者宣称社会科学的基础本身就是脆弱的;常常我们以为是

客观的、科学的知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用来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的伪装形式而已;社会科学最显著的特征,不在于其阐明既存社会政治实在的能力,而在于它们对现实情况不能提供任何批判性的视角;以及它们赋予已渗透到人类生活所有层面的社会技术性控制及操纵,一种虚假的正当性。人们逐渐怀疑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信念,即相信一旦人类对于社会政治的运作,逐渐获致系统性的、经验性的理解之后,自然会导向明智的决策,改善社会的不平等及不公道,解决社会问题。即使是价值中立及客观经验研究的坚决拥护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学科有些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经常被归因于社会科学的年轻及不成熟。

局外人的批评或许可以当作无知、外行而不加理会。最让专家困扰的还是圈内人士的批评。这些专家都认为社会科学已经获得大众承认,成为真正的科学了。下一代的学者(拥有最精密量化及经验性的研究技术)将可以全心全力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其成为更加成熟的科学。但是有些圈内人士却觉得极端不满,大肆批评。世界各地学生运动的领袖,有许多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他们对于社会的批评和对他们自己学科的批评是息息相关的。

一些向来被认为是不相干的、垂死的、错误的或过时的探究途径,突然之间又充满了活力。从语言哲学的纯概念分析中所得到的主题,被用来批判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科学史及科学哲学晚近的发展,也威胁到社会科学家一向所抱持的有关科学及理论的看法。“硬心肠”的经验主义者一向所敌视的“软心肠”的现象学及解释学也大受欢迎。许多年轻的思想家认为:这两种探究途径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比起以精密严谨而自豪的经验研究,更能提供真知灼见。已经被宣布死亡或被确切驳倒的马克思主义,又在国际上展现新的活力了。

阅读社会科学过去十年来的相关文献,我们获得的第一印象是杂乱无章。一切仿佛都“唾手可得”。关于何者是确定不移的研究结果,何

者为适当的研究程序,何者为重要的问题,甚至何者为研究社会政治最有前途的理论途径等问题,都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共识存在——除非是同一个学派的成员。某个人一提出主张,另外的人就唱反调,互相辩驳,十分热闹,喋喋不休地竞相博取我们的注意。

xii

20世纪60年代如火如荼的论战,绝不限于社会科学的地位这类狭隘的学术议题。这些争执的激烈反映出人们关心一些较深刻、较广泛的议题。当人们感觉到他们正处于危机时期,当基础似乎动摇了,正统崩溃了,人们就会创立一个公共空间,在此,有关人类处境的一些基本问题将会重新被提出来讨论。本书主要的目标在于厘清、探索这些比较基本的议题。我希望阐明,本来只是有关社会科学的争论,只限于很小的学术圈子,现在却转移到一些基本问题上,譬如人性,何者构成关于社会政治知识,此种知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等等。

许多社会科学家都相信,在相对平静的70年代中,60年代许多混淆都将很快地过去。一些把社会视为一种复杂的动态均衡,而持“结构功能模型”的人,或者有些认为新的、更进步的“一般系统”探究,能使我们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人,都把这段时期视为一种暂时的紧张压力,而“调节机制”会再调整过来。他们说,让这批胡闹的批评者——这些人会越来越少——叫嚣说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假若我们是负责、认真、诚实的研究者,则我们的主张必须中庸、实际,但信念必须坚定,即坚信持续不断的经验研究将会增加我们对于社会的科学理解。而最终这种研究所能获致的有效的社会改革,将远比所谓的革命者的叫嚣大得多了。

我不否认这是一种普遍的态度,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家中间,也不否认有重大的理由去支持这种态度。但我希望能够证明,对于过去二十年所发生之现象的这种解释,基本上是一种曲解。对于过去所发生的,而现在仍然继续演变的现象,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如果我们能透视浮辞泛

语,即当我们能区辨何者为正确的批评,何者为错误的批评;何者为夸张的批评,何者为中肯的批评时,我们就能觉察到正在发展中的一项复杂论证的轮廓:一种正在浮现的新感知性(new sensibility),目前虽然还是很脆弱,但终将导致社会政治理论的重建。在此“论证”一词具有双重的意义:在比较古老的用法中,论证指一段情节或一则故事。我要展示此一情节的轮廓,把它带到前台来。而论证比较正规的用法则是指一种理性论证。我们可以发觉最初似乎是相互独立的探究路线,只是一项复杂论证的各个阶段或步骤,而整个论证的力量比其中任何部分都要大得多。一套恰当的、广博的政治社会理论,必须同时是经验性的、解释性的以及批判性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必须如此,以及经验研究、解释及批评如何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等问题,在此一潜在的构思中将可以逐渐明朗起来。

在本书一开头,我不打算把我正准备证明的一个清晰论题提出来。我只提出一个模糊的征兆,暗示有关行动、社会及理论等的基本议题已经在论战之中被提出,而社会科学的批评者和辩护者都只是在自说自话。当务之急乃重新检讨一个受到严厉批判的观念,即相信社会科学应该是研究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和目前已确立的自然科学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某些批评者认为社会科学要模仿自然科学的想法十分肤浅,甚至很愚蠢。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个信念基于一个简单的或过分简化的谬误,例如社会科学都是天真质朴的实证主义,然而实证主义已经被驳倒了,或至少已被彻底修正了,所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驳斥基于此一错误基础的社会科学了。另外一些批评者则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在于肯定事实与价值的严格二分法,而此种僵硬的划分是不可靠的,所以整个社会科学就崩溃了。在社会科学某些批判性讨论中,有一种隐藏的本质主义。有些批评者——辩护者也是一样——总以为社会科学运用自然科学的程序来研究社会政治,只是牵涉到“一个大原则”。只要将此项大原则加以揭露、驳斥,那么整个社会科学就会土崩瓦解,而不

必考察各门社会科学的烦琐细节。

由于经常有人倡言社会科学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因此在一个更精微的层次上，反对者就提出种种“不可能性”、“超验性”或“概念性”的论证，以证明要建构此种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因为此种社会科学观根本就是概念上的混淆。我不相信任何“不可能性”的论证能够成立。而且由于哲学上的理由，我也不相信社会研究的认识论地位可能有这种确定不移的、先验的论证。^①数百年来，对于社会研究的真正性质，虽然有人 xiv 一再地提出超验的或不可能的论证，然而随即又有反对的论证产生，证明其无法成立，从这种反对论证中可见建立一门研究社会中之个人的实证性、经验性的自然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可超越的理论障碍存在。关于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思考已经从这些讨论当中浮现出来了，我并不是暗示把社会研究当作不成熟的或年轻的自然科学的看法没有问题。但是社会研究是不是真正的科学，或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是否无法用科学技术来研究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是混淆（而非厘清）自然科学与社会研究的异同。

我首先要讨论的是，主流社会科学家对于他们的学科的理解。我用“主流社会科学家”是指那些认为社会科学与成熟的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的人。他们相信社会科学最大的成就乃寄托在模仿、修正、适应那些在我们对自然的科学理解中，已是成功的技术。我们不可把“主流社会科学”想象得比实际的更为一致、更为同质。因为其中不仅对自然科学的本质特征有重大歧见，而且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似性也莫衷一是。然而，我觉得应该重视实际在做研究且在方法论上自觉的社会科学家的意见，而不应完全听信社会科学哲学家的说法。社会科学哲学经常成为自然科学哲学贫乏的同父

① 参阅《实践与行动》，第四部分，关于我怀疑此种先验的或超验的论证的理由。

异母姐妹,只是探讨一些一般认识论的争议,与社会学科的实际研究毫无关联。

诚如我将在第一章中阐明的,主流社会科学家相信他们的学科是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比较年轻而已,他们这个信念源于他们对于经验理论之性质及重要性的理解。因而必须探讨何谓经验理论,经验理论与类型的理论活动(例如所谓的规范理论)如何区别,为何他们认为经验理论对于社会各学科的科学地位是如此重要。尽管主流社会科学家之间有许多的歧见,但是他们对于经验理论之认识论特征以及逻辑特征的理解,却极为一致。不过对于何者能满足甚或接近该种理论的标准却缺乏任何理性共识。

对于社会科学的自然主义观,只有在提出来加以探讨之后,我们方能评估其优、劣,其所见、所蔽。我将集中于直接向这种社会学科的自然主义式理解的主张挑战的三种当代取向。每一种取向皆针对社会科学之基础来进行批判,每一种取向皆提出一种它自认为更高明的社会政治探究途径。

第一种思想取向系基于分析哲学,特别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所倡导的“语言学转向”。社会科学并非两人的主要兴趣,甚至对于他们的研究与社会理论究竟有何关联的问题,也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但受两人影响的许多思想家却论证:以往社会科学家对于行动之性质、描述及说明的自命不凡的主张,已经受到有关语言复杂性(特别是行动的语言)的新见解的挑战了。他们论证,对人类行动的描述和解释要完全纳入经验性自然科学的规格中,根本是错误的见解,而且是观念上的混淆。

再者,最近分析哲学家之间的一个最重要、争议最厉害、高潮迭起的领域,就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过去短短几年之中,我们对“科学形象”(image of science)的理解,已历经了一次实质革命——至少和实证

* 即分析哲学、现象学及批判理论,分别在本书第二、三、四章中审视。——译注